

中 国

1

主 编／谭其骧

副主编／王文楚

／赵永复

历代 地理
学家 评传

总结研究成果，评述古人成就。

传播地理知识，弘扬祖国文化。

山东教育出版社



2 035 1576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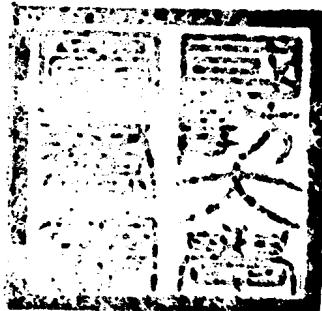
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

第一卷

(秦汉魏晋南北朝唐)

主 编 谭其骧

副主编 王文楚 赵永复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济南

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

第一卷

谭其骧 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4 插页 224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20

ISBN 7—5328—0871—8/G · 723

定价5.70元

前 言

本世纪三十年代至今，中国地理学史的专著已出版了王庸、侯仁之、王成组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所著四种，内容都相当丰富出色。但他们主要以研究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为主，对这些学识的发明者、阐述者其人其事，则有的根本不提，有的略而不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共同的缺憾。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与其学术成就一般都具有深切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过程，我们深觉有对历代卓有成就的地理学家一一列叙其生平，评述其成就的必要。因而我们邀集了十几个单位几十位同志，合作编写了这部《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加深对这些地理学家的时代与生平的了解，从而能够深入地认识其学术在地理学史上的地位。

然而要编写这么一部地理学家评传，困难很多，无论比编写文学家、哲学家还是史学家评传，都要困难得多。首先是著名的古代地理学专著和地理学专家都不多，评传若只收有名著

的专家，为数太少，不足以显示我国历代地理学发展的全貌。若不以有名著的专家为限，则古代学者著述中有部分篇章段落涉及地理学者的又太多，在这大量学者中，又将采用什么标准确定哪几个应列为地理学家？其次是有不少著名的古代地理著作无法确定其作者为谁，对这些无考的作者在评传中将作何处理？再其次是既然是评传，自应将其人其学联系起来予以评述，但地理学家的生平事迹可考见者一般远比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为少，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也要困难得多。还有一点困难是传世的历代地方史和地方志数以千计，其中有一部分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这种著作算不算地理学著作，作者算不算地理学家？若要从中选择其一部分，选择的标准更觉难定。

所以现在我们奉献於读者之前的这部评传，决不是一种成熟的作品，只能算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而已。我们是本着下面几条原则处理上面提到的那几个难题的：

1.先秦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言中，常有一些有关地理学的论述，显示其人有一定的地理学知识和深度。但流传下来的论述仅限于三言两语，或片言只语，其言既不能称为一种地理学著作，其人自亦算不得一位地理学家。凡此一概不收入评传。

2.在先秦古籍中，《管子》有地图、水地、地员、度地四篇有关地理的著作，长达数千言；《山海经》的《五藏山经》以叙述各地山川道里物产为主，都凡二十六篇、二万余言，这是两种我国最早的重要地理专著。但《管子》一书出于后人依托，内容庞杂，兼有战国诸子思想，难以指实某篇出于某人之手。《山海经》是由战国秦汉前后几代许多巫者方士述作汇集而成的一部丛书，各篇的述作以及《山经》、《海经》、《荒经》

各部分的汇集时代皆无可确考，当然更无从推定有哪几位作者。所以在地理学史上虽然这是两部不能不提到的重要著作，在地理学家评传中我们却无法列入。

3.有些古代地理著作如《禹贡》、《穆天子传》、《三辅黄图》等，不象书成於众手，而应为一人的作品，作者的姓名虽无法考定，我们即以某书作者标目，为其人写一篇评传，除评述其学术成就外，尽可能推定其时代、地域与学术渊源。

4.古代出使绝域使者，归来述其在域外诸国所见所闻所经历，往往为史学家采入史籍。我们认为这种篇章虽最后写定於史家，成为史乘中的一章，其初稿应视同一篇地理学作品，其作者即这位使者本人。如《史记》两《汉书》中关于西域的记载，应以张骞、班超、班勇为作者，不作为司马迁、班固、范晔的作品。

5.凡以高官合门客僚属之力制成的图籍，如裴秀《禹贡地域图》、贾耽《海内华夷图》、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皆径以领衔者作为作者，但其人与此书之实际撰成关系，传中应尽可能表示之。

6.刘向论“域分”，朱轩条“风俗”，乃汉成帝时的地理著作，至东汉明帝时为班固辑入《汉书·地理志》，因而得以流传至今。今即以班固为作者，刘向、朱轩附见。其他史籍有辑录前人零篇碎什者亦同此例。惟传文中必须尽可能详著所本原稿，不容予以泯没。

7.司马迁当然首先是一个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第一流的文学家，但《史记》中的《货殖列传》是一篇极高明的区域地理著作，《河渠书》是中国第一篇水利史专著，都具有重大地理

学价值，所以他应该当之无愧地被列为地理学家之一，并且在评传中以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为主要内容。其他学术上的通人，只要在其著作中有一部分篇章对地理学卓有成就，尽管数量不多，皆同此例。

8. 地理学家的生平事迹无可确考者，宁缺无滥，但可从其作品中推定其大致时代、社会地位与学术源流等。

9. 自《越绝书》、《华阳国志》以下，历代地方史中不乏佳作；但论其性质，毕竟只是地区的历史而不是地理著作。宋元明清的图经方志，乃一地的会要或类书（百科全书），地理仅为其中一部分内容。且数以千计，选择标准难定。故在这部评传中一概摒而不录。地方史和地方志中当然都有部分内容具有地理学价值，亟盼日后史地学界同志中有志于此者能出而将其精采篇章汇集成书，并考定其作者生平。

就我国历代著名地理学家的生平与成就，广泛而审慎地搜集、分析有关原始资料，尽量采纳前人可取的研究成果，认真进行科学地概括与评价，这是我们全体撰稿人共同的心愿与努力目标，但不等于我们确是做到了。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各撰稿人都根据具体情况，或众说并列，或凭己意鉴别，有所取舍，也可以自创新说。全书是全体撰稿人的集体著作，各篇立论皆由撰稿人各自负责。编者只在取得撰稿人同意之下，对少數体例不一致之处稍作文字上的改动。

1985年秋，我们三个人应山东教育出版社之约，承担了这部书的组织工作。经过一番编稿要求与条例的商订，列传人物的拟目，通过各种途径，约请各方专家承担各篇撰稿人。因全书字数当在百万左右，卷帙过巨，拟按时代分三卷陆续出版。

热烈期望读者在读到本书后多多提意见，包括在列目与评传内容等各方面存在着的问题，和应增应删之处。

这部地理学家评传能够出版，是得到山东教育出版社领导及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邹逸麟教授的鼎力支持和热忱帮助，邹健同志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深为感谢。

谭其骧

1989.5.30.

目 录

目录

(1)

前 言	譚其骧〔 1 〕
《禹贡》作者	刘起舒〔 1 〕
《穆天子传》作者	史为乐〔 7 〕
马王堆古地图作者	张修桂〔 19 〕
张騫	安作璋 张汉东〔 51 〕
司马迁	葛剑雄〔 73 〕
班固	周振鹤〔 87 〕
班超 班勇	安作璋 张汉东〔 93 〕
《三辅黄图》作者	马正林〔 115 〕
杜预	钱林书〔 127 〕
裴秀 京相璠	曹婉如〔 143 〕
郭璞	李仲均〔 159 〕
法显	胡菊兴〔 173 〕
阚駢	赵永复〔 187 〕
盛弘之	张修桂〔 195 〕

目 录

(2)

郦道元	陈桥驿〔209〕
杨衒之	钮仲勋〔233〕
玄奘	张广达〔241〕
贾耽	张广达〔257〕
李吉甫	史念海 曹尔琴〔269〕
樊绰	周维衍〔309〕

《禹贡》作者

刘起抒

我国古代有两部有名的地理著作，但一部实是保存了丰富的地理素材而附丽以高度神话性的《山海经》，它开了幻想的一派，《穆天子传》、《淮南子·地形篇》、《神异经》、《十洲记》、《博物志》等承其风，其末流极于《西游记》、《三宝太监下西洋》、《镜花缘》等演义，因此不能把这一派这些著作认真当作严肃的地理书看待。一部则是科学性的《禹贡》，它开了征实的一派，《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及唐宋以来的许多地理专著，都遵奉着它这一如实地记载地理的严肃态度，因此《禹贡》成了我国古代具有崇高地位的地理学

宝典，也就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第一部要著。这些是顾颉刚早已指出的^①，即是日本学者也誉它为古代典籍中的“雄篇大作”。^②

《禹贡》被编在最古的史书《尚书》中的《夏书》里，旧注疏家把它说成是大禹治水之后，分别九州，制定贡赋，由史官加以纪录而成的经典，所以叫《禹贡》。宋代学者则说只有首、尾数句是史官所加之辞，其原有全文为史官所不能知而由禹自己具述治水本末上奏于帝舜之文。^③因此是大禹原作于虞时，夏史加头尾以编定于夏时，距今已四千多年了。

其实《禹贡》与大禹无关，也不是虞代或夏代的著作。近代对它的著作年代及作者进行探索者不乏其人，主要提出了下列几种不同意见：（一）成于西周时期。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以为周初人所作，辛树帜先生《禹贡新解》详论为西周时作品，徐旭生《读山海经札记》^④亦以为不惟可能是春秋，更有可能是西周。而皆未提到作者问题。（二）成于春秋时期。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谓春秋时孔子所作，王成祖从地理学角度研究，撰《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时代》，亦主张是春秋末期周游列国博学多才的孔子所作。上引徐旭生语，亦以为有可能是春秋时。（三）成于战国时期。此为顾颉刚所主张，也未提作者是何人。其说始见于他的《论今文尚书制作时代书》^⑤，中间屡见于其著作和讲义中，最后写定于《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全文注释）》中。而后学术界大都同意

①见《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全文注释）》，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②见内藤虎次郎《禹贡制作时代考》。

③据傅寅《禹贡说断》引“张氏曰”，可能是张九成。

④附录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末，科学出版社，1960年。

⑤《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此说，如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① 即承此说，日本内藤虎次郎《禹贡制作时代考》^② 亦主此说。（四）还有人说是秦始皇统一后的作品。^③

诸说中，顾颉刚提出的如下几点论据较有说服力：（1）春秋以前对于禹的神话只有治水而无分州。至战国之世，七国扩展疆域，当时人把这疆域作为天下，《孟子·梁惠王上》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于是九州说出现。邹衍大九州说，亦在此空气下出现。（2）《禹贡》文中有内方、外方。是楚国自丹、淅二水间迁都于今江陵县立国后，就河南叶县山上筑方城以为北面屏障。于是称其南的今湖北钟祥县的章山为内方山，其北的河南登封县的嵩山为外方山。这不是春秋以前所能出现的名词。（3）扬和越二字双声同义，扬州实即越州。公元前512年吴境北及淮水，及越灭吴，拥有淮水以南之地，此时此区域才可称越州，亦即扬州。（4）秦惠王灭蜀，然后才有《禹贡》称为梁州之地。（5）中国使用铁器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而《禹贡》梁州贡物有铁和镂（钢），亦据战国情况写入。以上各点确实是《禹贡》成于战国的重要证据。顾颉刚尚有一点说，《禹贡》中有菏水，是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在宋鲁之间所开一条连泗、济的运河，故《禹贡》必作于夫差开此运河之后。这一点尚可商榷。《水经·泗水注》载郦道元亲自验证，此水只是夫差把它“浚广”了，而非新凿。再核以事实，夫差赶到黄池来与会的军事倥偬中，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又在古

①《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

②见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

③见《禹贡（全文注释）》引述了此一句，未说何人所主张。

代的技术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开凿这样长的一条不小的河流的。再从记载此水的古代诸文献包括《禹贡》在内，都把它和淮、泗、济、汶等水一样作为自然河道叙述，故程大昌《禹贡论》考定菏为原有之水，出陶丘菏山，济水过此会菏，正和在其北会汶一样。因此很难说吴王夫差开凿了此河，自然也就不能据此说《禹贡》写成必在夫差此事之后。

据顾颉刚所提五点论据，自可肯定《禹贡》最后写定于战国之世。但古代文籍总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往往是经过一个较长流传时期，由前后不同的人递增而成，所以先秦文献往往反映不同的时代痕迹。《禹贡》主要方面反映战国地理情况，但其中亦有不少内容不能晚于春秋时，又常有战国出现新情况以前的事。如上引吴王夫差，又在春秋之末曾“城邗，沟通江淮。”^①《孟子·滕文公上》说禹“排淮泗而注之江”，即是就淮泗已通江以后的情况而说的。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可是《禹贡》中不言江与淮通，则所说的江，显然早于夫差开邗沟以前。又《禹贡》中的大河，北经大陆泽，再北入海，即自南向北直贯今河北省境。据《周谱》说周定王五年河徙^②，始离大陆泽之南向东行。虽焦循《禹贡郑注释》以为定王五年无河徙事，杨守敬《禹贡本义》则又全驳了焦循之说，以为定王五年固有河徙，不过可能影响较小。近人史念海推崇焦循说^③，而谭其骧略同于杨守敬之信其有，以为不过是很多次河决中的一次，并进而以为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齐、

^①见《左传·哀公九年》。

^②据《汉书·沟洫志》载王横所引。

^③《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陕西师大学报》1978年1期。

赵、魏等各在河两侧筑堤，而后大河走《汉书·地理志》河道。①是《禹贡》所记河为在此以前之河，根本不知有河徙之事。又冀州一词，在春秋资料如《左传》等书中，皆指今山西省境，北及今内蒙。至战国资料如《山海经》、《逸周书·尝麦》、《晏子春秋》、《楚辞·云中君》等文献中，皆扩展冀州的含义为指中土、中国、天下。而《禹贡》所用冀州一名，仍保持其旧义，其州域即春秋时所指的晋境，显然在战国用以指中土、中国、天下以前。又《禹贡》各州之土壤，其颜色未按五色分配，于徐州却又独贡五色土，此皆在战国五行说盛行以前。又《战国策·魏策一》载苏秦说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而《禹贡》只有荣而无鸿沟，亦知此在战国以前。由这些即可知《禹贡》初稿反映的是春秋之世地理情况，流传至战国之世，又有了许多战国才有的地理情况，它的全文经过了不断修订增补的过程，像最前三句和最后两句，如宋儒所说，是最后才加上去的。

文既不成于一时一手，自然难定其作者为何人。最早说它的作者是夏史官或夏禹，那是无稽妄谈。说是孔子所作，亦为毫无证据的猜想。辛树帜《禹贡新解》说是西周的官书。说西周是有待商榷的，说是官书即王家官吏撰写和掌管的书，则是近实的。顾颉刚在《禹贡(全文注释)》中推测说：“《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因为他对于陕西、甘肃、四川间地理最明白，其次是山西、河北、河南。因此，陕西的雍水，河南的涧水、瀍水虽都是三四等的河流，他都记得清楚；到了东边，他就迷糊了。最显著的错误，是长

①《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

江的下游。他在导水章里讲：汉水自入长江以后，又从彭蠡（今鄱阳湖）出来，‘东为北江，入于海’。而长江呢，和汉水一起流到彭蠡之后，又同汉水分家，‘东为中江，入于海’。汉与江平行入海，这是一个千古奇闻！而且汉为北江，江为中江，那必然还有一条南江。这南江是现在的什么水道呢？从前学者因为经书作于圣人，认为绝对地正确，所以想尽方法作解释，而没有一个说法站得住，就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的原故。现在知道，《禹贡》的作者是西北人，他的地理知识自有其局限性，他那时绝不能对东南地理弄清楚，以致出了这般的岔子。其它地方，像导山章，在今河南的桐柏山和湖北的大别山本相连贯，他却分置在两列；四川的岷山和湖南的衡山毫不相干，他却合在一条线上，这也是他不明白东南地理的一个证据。”

顾颉刚又就为什么《山经》和《禹贡》作者都是秦国人而当时六国岂无此类作者的问题作了解释，指出那是因为六国纵有比秦国更丰富的典籍和地理著作，都被秦统一后“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而烧掉了，只有秦国自己的书传下来。他的这一论析是有道理的。史念海的《论〈禹贡〉的著作年代》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以为是站在魏国立场说的，所以才指魏西秦东之河为西河，因而定《禹贡》作者为魏人。以为若是秦人，不当把本国东边的水称西河。其实，《禹贡》标榜为大禹治水分州之作，天下贡赋都送到禹都所在的冀州来，其称西河、南河，是据禹都所在的冀州立论，初非就魏国来说。我认为，顾颉刚说“可能是秦国人”，只是提了可能性，没有论定，所以较妥当的说法，还是应如顾颉刚在文中所说：“《禹贡》的作者是西北人。”

《穆天子传》作者

史为乐

《穆天子传》是晋代汲冢出土竹书中的一种。《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279）十月，“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①这里所说出土竹书用小篆书写，是不对的，据荀勗《穆天子传序》

^①关于汲冢竹书出土的时间，除《晋书·武帝纪》作咸宁五年（279）外，《卫恒传》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正义》引王隐《晋书·束晳传》作太康元年（280），《晋书·束晳传》和荀勗《穆天子传序》作太康二年（281）。雷学淇《竹书纪年考证》说：“竹书发于咸宁五年十月，明年三月吴平，遂上之。《帝纪》之说，录其实也。余就官收以后上于帝京时言，故曰太康元年。《束晳传》云二年，或命官校理之岁也。”